

读书者说

《向北方》:为了一件大事

□ 府建明

在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上,解放战争中的三大战役、渡江战役等,呈现了一幅幅宏阔的历史画卷,它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新生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决定性基础。人们通过大量的历史著作和影视作品,对这些重大历史事件有了深入了解。但相当多的人也许并不清楚,在解放军的铁流滚滚向南的同时,有一批人冒着生命危险,克服种种艰难,秘密踏上了向北的路。这些特殊的“逆行者”,为什么去北方,又是如何去北方的,而去北方又昭示了什么?最近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向北方》一书,就记述和回答了这些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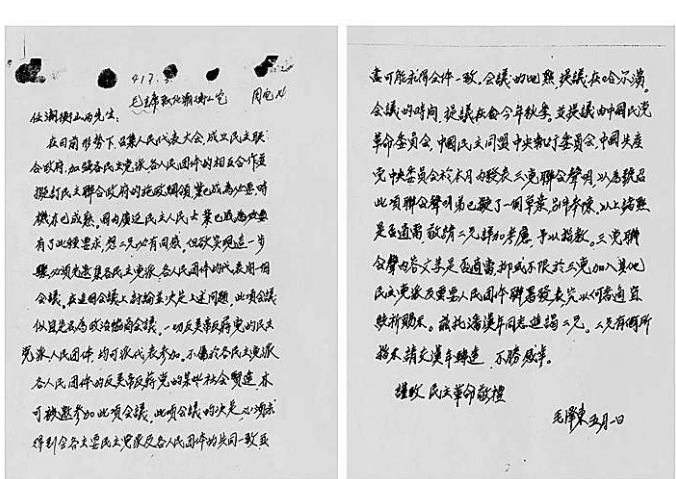
《向北方》是一本非虚构的历史纪实作品,反映的是当时进步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由香港去北方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建新中国的非凡过程。该书由全国政协文史馆的李红梅、刘仰东两位研究员精心撰写而成,他们通过大量的珍贵史料,爬罗剔抉,构沉梳理,全面真实地呈现了新中国建立过程中的这独特一幕。全书言必有据,即便是合理的推理,也必有考证比勘,体现了严谨的史学作风;而文笔生动、叙述精致,反映了高超的写作技巧。至于书中穿插的珍贵历史照片与精心设计的历史地图,更给人以一种历史带入感。读是书,真可谓开卷不能释手,掩卷令人深思。



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在北平中海合影。筹备会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任的常务委员会。



《向北方》李红梅 刘仰东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48年5月1日,毛泽东致李济深、沈钧儒信。本文图片均选自《向北方》

为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

早在1948年春天,随着人民解放军由战略反攻进入战略决战,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以其远见卓识,审时度势,开始谋划新中国的建立。而建立一个全新的政权,必须得到全国进步民主人士、社会贤达和各界人士的支持。因此,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时,发布了“五一口号”,倡议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毛泽东还另给李济深和沈钧儒这两位德高望重的民主人士写了信,阐述了召开新政协的意义和时机,并以“提议”的方式真诚地征求他们的意见。中共中央的“五一口号”一经发布,立即引起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热议。由于当时大多数民主党的总部设在香港,许多著名人士也集聚在香港,因此“香港潮涌”成为“向北方”这一事件的开篇。

从《向北方》一书中看出,由于大多数民主党派经过14年抗战的艰辛,渴望获得真正的和平,而重庆谈判、旧政协会议的失败等阴影,又让他们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深感痛恨,因此,当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口号”时,很快得到这些民主党的热烈响应。这是一个公开响应的政治团体是谢雪红任主席的台盟,其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称,中共的号召“正切合全国人民的要求,也切合台湾全体人民的愿望”。而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民革、民盟、民进、民促、民联、致公党、农工党、救国会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则以联合通电的方式响应中共号召,他们在通电中称,中共的号召“符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后来,民进等党派还单独发表宣言,称中共的口号“为近百年来中国革命史的结晶,是今后中国政治运动舵向的指标”。

各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尽管在其他方面的主张不尽相同,但在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点上,则非常一致。而这种一致,是基于他们自身对谋求建立一个统一、民主、光明的新中国的愿望,他们相信只有借重中共才能实现这种愿望。正是因为如此,他们积极准备北上,参与新政协的筹备和召开。

作为民革中央主席的李济深,是中共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头号人物,他把这次北上称作“为了一件大事”,而这件大事是“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这可以说是

表达了当时各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的共同心声。

克服种种艰难险阻,秘密北上解放区

关于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的情况,以往见诸一些回忆性的文章,但大都较为零星,难窥全貌。《向北方》一书通过各种亲历者的日记、回忆录、访谈录以及相关研究资料,经过综合分析,为我们描绘了这一完整的过程。

按该书所述,由于当时国共两党大军正进行战略决战,把聚集在香港的民主人士通过陆路或空中直接送入解放区根本不可能,所以周恩来最初曾设想开辟一条“香港—英国—苏联—哈尔滨”的空中专线,但终因港英政府的推托而未果。于是重新设计了“香港—罗津(朝鲜)—哈尔滨”的海路送线,但这要通过台湾海峡,以及国民党军队的海上封锁线,可谓危险重重。为此,周恩来专调钱之光前往香港,而中共香港分局也成立了由潘汉年、夏衍、连贯、许涤新、饶彰风的五人小组,精心组织运送民主人士的工作。运送的路线后因战事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有的在大连登陆,有的在天津登陆,有的在青岛登陆。

据参与运送工作的杨奇和罗培元回忆,从1948年9月到1949年9月,由香港运送出的各界人士,大大小小共有20多次,共1000多人,其中民主人士350多人,出席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有170多人,超过了代表总数的四分之一。而《向北方》的两位作者通过认真分析,将这个170多人精确到177人。

单从这些数字来看,就知道运送工作的不易。但最为艰难和危险环生的事,主要发生在离港的过程中。为了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港英政府的阻挠,那些著名的民主人士,包括许多德高望重者,个个乔装打扮,而中共人员更是采用了种种调虎离山计,方才把他们安全送上北上的轮船。即便是这样,原为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的著名军事家杨杰,还是被毛人凤派去的特务所暗杀,最终成了带黑框的政协代表。杨杰的遇害,社会各界无不震惊和痛悼,同时更加激发了广大民主人士对蒋介石的痛恨。加快北上,成了他们最大的愿望。

与在国统区和香港的境遇不同的是,民主人士历经艰险到达解放区后,即受到中共领导人热情而真诚的接待。如第一批民主人士沈钧儒、蔡廷锴等四人抵达朝鲜罗津港时,东北局负责人李富春专程前往迎接。沈、蔡等一行乘专列抵达哈尔滨后,东北局领导人高岗、陈云、林枫、蔡畅等悉数在火车站迎接。现在留有一张沈钧儒走下专列的照片,这位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副主席,走出车门时,脸上露出不加掩饰的笑容,说明其心情是极为愉快的。而蔡廷锴则在日记中用了“招待甚周,无微不至”八个字,来赞许中共对他们的态度。

其后抵达北方解放区的各批民主人士,同样受到中共极高的礼遇。特别是作为民主党派旗帜性人物的李济深的到达,周恩来尤为重视,他亲电东北局,就接待工作做出具体部署,甚至细到如

何安排欢迎宴会上的座次,这让李济深十分感动。黄炎培是由天津直抵北平的,董必武、李维汉等中共领导人亲自到车站迎接。又因同日恰是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入京,黄即于当日见到了毛泽东,并于次日接着晤谈,成为民主党派中的第一人。

华侨领袖司徒美堂的到达,则是周恩来亲自到车站迎接。司徒老人在受邀去毛泽东的双清别墅时,毛泽东鉴于其年过八旬,特嘱用担架抬其上山。但因没有现成的担架,就用毛泽东的藤椅绑上木棍作为“轿子”。毛还叮嘱抬担架的年轻人:“一定要轻轻抬起来,抬上肩后要走得稳,千万不要担架晃动。这让司徒美堂非常感动,由此留下“大家既是坐轿者,又都是抬轿者”的佳话。

正是有着在国统区和解放区的冰火两重天的感受,这些著名的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甫一到京,就全身心地投入到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工作中,并积极献计献策,为新中国的成立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共襄伟业,在中共领导下擘画开国

如果说人民解放军的不断向南是中共党史的“正篇”的话,那么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的向北方就是中共党史的“外一篇”。阅读这个“外一篇”,我们在感到精彩之余,还会获得这样一些启示:

(一)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关于这个问题,熟读历史的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可以说是心知肚明,所以把他们统一战线列为中共的三大法宝之一。在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就积极与民主人士和进步人士相接触,以争取他们的支持,并通过他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民主人士和进步人士也通过自己的遭遇,大都放弃了走中间道路的幻想,积极向中共靠拢。譬如龙云在认清蒋介石的真面目后,就形成一句口头禅:“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龙云作为新政协的“特邀代表”虽因时局而没有出席,但他的态度反映了“人心向背”这一铁律,也诠释了中共统一战线的魅力。

(二)中共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关于新政协由谁来领导、中共与各民主党派是什么关

系,曾经在民主人士中有过分歧。大多数民主人士认为,新政协应由中共召集和领导,因为中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英勇”;如果没有中共,连新政协都不可能召开,更遑论建立新中国。曾经有过犹豫的李济深,抵达沈阳后也表示:“我既下决心并来到解放区,这一行动就表明了拥护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新中国。”谭平山则说:“这个新政协,是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分担革命责任的会议,是要大家负责任的……而领导的责任,更不能不放在共产党身上,这是历史发展上一种不容放弃的任务。”朱学范更是坦言:“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都是不能胜利的。”由此看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真不是人为自封的,而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

(三)现实是最生动的教科书。人们常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但对于那些饱读诗书的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来说,现实的对比是更直接的教育。他们在国统区大都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政治迫害,感到心灰意冷、前途黯淡,而甫一进入解放区,就得到中共领导人的真诚欢迎和热情接待,其心情之好可想而知。后通过各种参观,他们目睹解放区与国统区截然不同的氛围和面貌,感到自己一生追求革命和进步的目标终于能够实现了。为此,当时北上的民主人士曾发表了一个联合宣言《对时局的看法》,无保留地表达了这种欣喜之情。后来,新政协的筹备与召开,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与组成,进一步印证了这些民主人士的感受,即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合作是完全真诚的,而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也最终成为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之一。

总之,《向北方》一书给人启发多多,是一部难得的历史纪实作品。我们党一百年来来的实践证明,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向北方》以大量的史实说明了这个道理。在大量的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其出版有着特殊的意义。重温这段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共不平凡的历史,从中受到教育。

(作者系凤凰传媒编委会编委、编审)

光明书话

商务印书馆近日出版了我的《汝信文集》(8卷本)使我深感荣幸。该书收入了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在各种报刊和出版物上发表的绝大部分文字,可以说是大半辈子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从事研究工作的一个真实的记录。但我多少还有一点自知之明,绝不敢有“文章是自己的好”那种不切实际的狂妄念头。这些文章涉及面较广,但缺乏专业性系统的深入研究,有的只是暂时填补研究空白,起抛砖引玉的作用,其学术价值是不高的。

跨进了哲学与美学的门槛

有人称我为“哲学家”“美学家”,实在愧不敢当。其实,我只是半路出家的“杂家”。我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的是政治学,副修经济学。在这所教会办的大学里采用的是美国大学通用的教材,其严重脱离中国的实际是可想而知的。大学里讲授的课程大多引不起我的兴趣,我的学业成绩也只是平平而已,算不上一个好学生的,也从未有过将来当一名学者的雄心壮志。当时作为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的参加者和一名地下共产党员,我的志向是参加实际革命斗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改造这个不合理的旧社会,因此上海刚解放,我就参加了人民解放军,生怕失去解放全中国最后一战的机会。我们的部队本来准备南下渡海作战,但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局势发生根本变化,同时也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关于这段往事,我曾在一篇带有自述性的文章里有所叙述:

“1950年冬,我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在冰天雪地里正好赶上了第二次战役,然后又南下参加了第五次战役,从长津湖一直前进到三八线。在艰苦的行军和敌机轰炸中几乎把随身用品丢个精光,成了彻底的‘无产者’,战役结束后转移到后方休整,却意外地发现,在出发前轻装时留下的物品中还保存着一本俄文的《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它是我出国途经沈阳时在国际书店买的,成了我在朝鲜战场能用来提高俄语水平的唯一工具。这样,由于偶然的机会,我开始接触到西方哲学和美学。我学俄语不久,要读懂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其困难是可想而知。在防空洞里微弱的烛光下,我逐字逐句地啃,翻来覆去地琢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意思,有时简直是在猜。这样硬啃苦学的结果,不仅逐渐增加了我对这位‘俄国的普罗米修斯’的理解并油然而产生了崇敬之情,而且使我越来越对哲学和美学感兴趣。”

过去在大学读书时,除了听过徐怀启先生讲的“哲学与宗教”课程外,我对西方哲学是一无所知的。至于美学,在当时大学里就根本没有开过这方面的课程,对其内容更是茫然。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使我初步了解他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和美学的批判,特别是他的学位论文《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指明了美学的基本问题究竟何在。当时我不知道这篇论文已经有了周扬同志的译文,还用拙劣的文笔把它“硬译”出来。我感谢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他作为一个学者在沙皇残暴统治下始终坚贞不屈的伟大人格感动了我,并帮助我跨进了哲学与美学的门槛。现在回忆起来,在朝鲜战场上的几年实在是我的学习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做学问,研究科学,要甘心坐冷板凳

为了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1956年我决定离职投考副博士研究生,因此下决心同时报考了人民大学何思敬教授和哲学研究所贺麟教授指导的黑格尔和哲学研究生。为了应付考试,我临时抱佛脚找了一些参考书来补课,结果居然两处都录取了。哲学所属于科学院系统,去那里学习更方便些,这样我就成为贺先生门下的研究生。

贺麟先生学贯中西,学识渊博,早年留学美国、德国,是我国著名的西方哲学专家,对黑格尔哲学尤其有全面深入的研究,他又是中国现代新儒家早期代表之一,精通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他收下了我这个哲学根基很差的学生,要我系统地从头补课,为我制定了学习计划,认真阅读从古希腊到近代的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些重要原著,当然更着重指导我读黑格尔的主要著作,特别是《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和《美学》。黑格尔哲学体系包罗万象,气魄宏大,思想丰富深刻,使我大大开阔了眼界,懂得了什么是辩证法,为什么它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从而促进了人类哲学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在黑格尔著作中,我十分赞赏并深受启发的是他的《美学》,它不仅引发了我对美学的兴趣,并以其博大精深使我认识到美学研究不能停留在抽象的概念探讨,必须结合实际,重视历史,必须要有很广的历史感和历史

我只是半路出家的「杂家」

《汝信文集》出版感言
□ 汝信



《汝信文集》汝信著 商务印书馆

视野,根据大量实际材料说话,否则就很容易流于空谈。对照过去读过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我写了《论车尔尼雪夫斯基对黑格尔美学的批判——兼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观点的哲学基础》一文,由贺先生审阅并推荐给《哲学研究》发表。这是我的第一篇有关黑格尔和西方美学的论文,它和后来发表的《黑格尔的悲剧论》都是这个时期钻研黑格尔美学的成果。从此我就开始了对西方哲学和美学的研究。

我结束研究生学习后,留在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研究组工作,这时我已放弃了原先打算回过头来研究经济学的想法,专心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史和美学史。从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近代西欧启蒙运动和德国古典哲学以至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和当代风行一时的存在主义,都曾是我研究探讨的题目,不过我的主要兴趣还是在黑格尔哲学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可以说是我哲学研究生涯中的学徒时期,寒窗十载,似乎刚推开一些门道,就遭到厄运。研究所工作陷于停顿,过去的研究成果遭到全盘否定,全体师生下干校劳动等待处理。这是我一生中白白浪费的最宝贵的年华。“文革”后期情况稍有好转,个人得到解放,又有了读书学习的机会。世界宗教研究所任继愈所长接受任务编写《中国哲学史简编》,他指名调我参加该书编写组,该组成员都是多年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专家,只有我是地地道道的门外汉。在任先生的指导下,我又一次埋头补课,研读了自先秦诸子至近代的一些中国哲学重要典籍,后来我写的有关儒学、韩非以及讨论中国哲学史上若干问题的一些文章都是在那时打下初步基础的。此外,我还和哲学研究所同志去学美学,编写出版了一部普及性读物《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

关于研究西方美学,我的思想也有所变化,过去我特别赞赏德国古典哲学的杰出代表康德和黑格尔所精心营造的美学体系,但是却越来越感到其局限性,因为它们并不能真正解决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美学问题。改革开放后出国交流和参观访问的机会多了,增长了见识,使我领悟到,研究西方美学还是要从实际出发、从生活出发,不能单从哲学家的书本上去讨生活。这就促使我尝试用另一种方式去研究美学,那就是利用在国外访问时直接面对一些人类伟大文化艺术创造的亲身鉴赏去进行美学的探索,陆续写成一些论艺术和艺术家的文字,以美学散记的形式编成《美的找寻》一书,也算聊备一格吧。

我大半辈子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谈不出有什么成功的经验,教训倒不少。真正要做学问、研究科学,不仅要淡泊名利,甘心坐冷板凳,还要心无旁骛、专心致志,才能攀登科学高峰。这或许是我体会到的最大教训吧。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学部委员)



1948年11月,从香港驶向东北解放区的“华中轮”上,周海婴拍摄的郭沫若、许广平、侯外庐(左起)。